



清华建筑系第一班

○钟炯垣（1950 建筑）

清华大学建筑系是在1946年成立的，是学校从云南昆明迁回北平复校的第一年。当时的建筑系称建筑工程学系，属工学院，院长是施嘉炆教授。那时清华大学在全国分区单独招生，考取建筑系的仅12人，主要来自北平、上海、广东、江苏、贵州等地。这12人是：杨秋华、朱自焯、钟炯垣、丁培良、虞锦文、蔡君馥、臧筱珊、黄钟寿、黄振鹏、宋华沐、刘仲良和汪佩虎。李乃彪由西南联大土木系转来，黄崎民和张德沛两人是由西南联大先修班直接升上来的。这样，学生一共是15人。

1946年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百废待兴。清华园里一面进行新生登记，筹备复课，一面修复校舍。宿舍连电灯都还没接通，每个学生发一个铁床，还要自己到物料股去领。记得当年善斋的电灯是在11月3日才接通，以后还经常停电。一年级的女生宿舍是古月堂，女教师住北房，女同学住东西厢房。全校的暖气是11月30日才开始供应，在这以前，住在善斋或新斋的男生在滴水成冰的屋子里盖着厚棉被穿着衣服睡觉。

新生还要通过体检和英文甄别考试（试题是翻译10个句子），这才允许注册，注册后取得注册组主任朱启章签章的学生证，才作为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

学校是在11月25日正式开学，但第一堂课不是在建筑系里上的，而是上大一

的国文课，国文课分别由余冠英先生和冯钟芸先生担任。冯钟芸先生指定我们读三本书：《鲁迅自选集》、高尔基的《母亲》和曹禺的《北京人》，读后要交一篇学习心得。国文和英文课都在二院上，也没有暖气，用煤炉取暖，一堂课下来，人都冻僵了。就在同一天，在水利馆楼上的建筑系公布了建筑系的四年课程表。在后来的四年学习中，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课程表进行的，没有什么变动，只是在解放后的1949至1950年度，增加了政治课的内容。

建筑系虽说占了水利馆楼上整个一层楼，但实际上只有一个仅能容纳十几个人听课的小教室、一个绘图教室，一个素描教室、一个图书室和一间办公室。图书室里的图书少得可怜，大部分都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几种杂志，给人以简陋和寒酸的感觉。绘图教室里分给每人一块木质的绘图板，素描教室里摆放了几尊石膏像和一些石膏模型，每人一个素描画板和架子。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我们1946级的同学开始进入到建筑殿堂里学习。

初期的教学活动

1946年，梁思成先生还在美国考察和讲学，并参加联合国大厦的审定设计，由土木系的吴柳生教授兼任系主任。吴柳生先生在土木系的教学任务比较繁忙，不

常到系里来，建筑系的一切工作实际上是由吴良镛先生一人负责。吴良镛先生当年只有24岁，由于他长了一副“娃娃脸”，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刚见面时我们还以为是同学呢。为了区别两个吴先生，我们称吴柳生先生为“大吴先生”，称吴良镛先生为“小吴先生”或“小吴公”。

记得第一堂“制图初步”课是12月2日下午开始的，也就是第一堂属于建筑系的课程，当然是由吴良镛先生担任，但他没讲如何制图，而是布置大家去南院的教授平房宿舍去测绘，然后绘出个平面图来。我们15人分成若干小组到南院去实测一下午，第二天的下午开始用丁字尺和三角板正式绘图。下午三个小时的课时是画不完的，大家很自觉地晚上加班把它完成了。从此，我们就开始习惯于夜里加班绘图。大家交图以后，由吴先生分别指出不妥或错误之处，然后才开始正式讲“制图初步”课。大学一年级除了公共课外，建筑专业的课程几乎全由吴良镛先生一人担任了。除“制图初步”外，他还担任“古典型范”、“阴影画”和“预级图案”三项课程。只有“素描”一项是由1947年初来校执教的莫宗江先生担任。

1946—1947年度下学期的“预级图案”课是学习建筑设计的开始，由吴良镛先生发给我们的题目单是设计一个园门。题目要求在一张图纸上绘出平面图、立面图和透视图，表达方式只许用黑白色。在这以前的“古典型范”课也是如此，每人用黑白色渲染出四种古典柱式（orders）的其中一种，目的是培养同学们的观察和表达能力以及墨色深浅的掌握。

进入1947年，刘致平、莫宗江、胡

允敬、汪国瑜、朱畅中、李宗津等先生来到学校。刘、胡、汪、朱等四位先生担任“初级图案”课，他们和吴先生等五人并没有明确分工，同学们在设计过程中有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五位提问和请教，他们五位也可以帮助同学们修改 sketch（草图）。到了1947年的下半年，1947级的17个同学来了，大家一起在东边的大教室里上设计课，系里才逐渐地热闹了起来。

梁思成先生授课印象

梁思成先生是在1947年9月从美国回国的，正好是我们升二年级的开始。梁先生除手把手地教我们建筑设计（当时的课程称“初级图案”）外，还担任“欧美建筑史”的课程。第一堂课是“绪论”，讲的是“什么是建筑”以及“建筑的三个方面”。下面抄录一段我珍藏近60年的笔记，帮助大家了解当年梁先生对建筑的一些看法：

何谓建筑 关于建筑的定义，各家的意见不一，有的以为建筑是建筑的艺术（the art of building），有些史家称之为 the art of building beautiful。这两个定义都不完全。因为建筑不单是艺术上的美观，并且还要包括在工程上的坚固与适用。

中文“建筑”二字由日译得来，此二字的意义译得并不好，因为建筑二字有包工营造之意，不能包括设计在内。

建筑的三个方面 全世界各地各个时代虽然产生种种不同的建筑形式，但不论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建筑物，都有它们的共通点。这些共通点可分为三方面来说：

（一）适用；（二）坚固；（三）美观。

可以看出两点：一、梁先生对“建筑”

□ 我与清华

一词一直是不满意的，他极力主张建筑系改称营建系。“营”是包括设计和规划，“建”是施工和技术。解放后的1950年实现了他的想法，把清华大学建筑系改称营建系，我们的毕业证书是这样写着的。但这称号只存在两年，1952年的9月和北京大学建筑系合并后，又改称建筑系。二、对建筑的三要素，梁先生是将适用、坚固和美观三者并列的，和后来官方提出的“实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的要求不同。其实这三者是不矛盾的，如何把这三者处理得恰当，正是建筑师的创作艺术。

梁先生的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语言流畅，经常用些生动和幽默的比喻使得课堂上充满活跃欢快的气氛。梁先生对欧洲流行的巴洛克式（baroque）建筑是不欣赏的，他用“毫不羞耻地暴露”来形容 baroque 建筑的那种近乎矫揉造作的、过分追求富丽堂皇的装饰和雕刻，给我们以很深的印象，以至后来我们之中谁稍有调皮或“越轨”的行为时，就被称之为 baroque。

最令我们钦佩的是梁先生边讲课边在黑板上描绘的建筑平面图和立面图，随手勾画，但比例、权衡是那样的准确，旁注的大写英文字母或魏碑体中文字排列得如此平直和适当，看着真是一

种艺术享受。还令我们惊叹的就是梁先生对中外历史事件的发生日期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建筑物的建造日期，他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梁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他要求我们把“欧美建筑史”笔记整理好后上交，他都逐一审阅。对学生的笔记审阅之细，可能是后无来者了。他把笔记中错误或遗漏的地方都逐一用红笔加以改正或补充，甚至连一个英文单词拼错都



1950年夏，1950届建筑系7位毕业生与林徽因先生合影，左起：张德沛、钟炯垣、虞锦文、林徽因、丁培良、杨秋华、黄畸民、朱自煊



2000年，1950届7位同学与林徽因女儿梁再冰（左4）合影，同学们的位置与上图相同

不放过。

梁先生从美国带回一批书籍和一套称为 elements of design 的挂图，并把挂图悬挂在图书室的墙上，供大家观看。梁先生这次回来，引进了新的建筑思想和建筑教育思路，从1947级开始，不再学“古典型范”了，代之以学习现代艺术。他带回来的书里，相当一部分是有关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可见当时梁先生就已经重视城市规划的问题，以至后来在建筑系里增添城市规划的内容，以及在解放后不久就对北京市有了总体规划的设想。可惜，梁先生的设想没有实现。

梁先生对培养一个建筑师的要求是很高的。他认为，一个建筑师不但要懂得建筑设计（这里包括艺术训练和建筑史），还应懂得建筑构造和技术、社会学、经济学等。所以，我们除了有大量的建筑设计以及素描、水彩、雕塑等美术课外，还有数量不少的工程技术课如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学、钢筋混凝土学等。

“baroque”和“玄武”

1948—1949年间，郑孝燮、程应铨、高庄、徐沛贞、李斛、张昌龄、周卜颐等先后到校任教。1948年9月，吴良镛先生赴美深造。1946级至1949级的学生依然在同一教室里学设计，梁、刘、郑、周四位先生重点指导我们1946级，但我们也经常找胡允敬、汪国瑜、朱畅中三位先生指导，高年级的同学也经常帮助低年级的同学。总之，到了解放前夕，建筑系充满了自由和民主的气氛，师生团结犹如一家人。高年级与低年级同学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很明显，特别是在建筑设计课程里，

教师们来回在图桌间穿梭，同学们一个个埋头绘图，有时画到得意处，或者得到了什么好灵感，就会来个 baroque 一番。张德沛会跳到图桌上跳起踢踏舞，嘴里唱着：

“Lay your pistol down ! Babe, Lay your pistol down ! Bang ! ”

曾在香港生活过的钟炯垣对李乃彪就会哼起 Stephen Foster 的歌曲和一些美国电影里的情歌。欣赏西洋古典音乐的朱自焯和虞锦文把莫宗江先生的柜式手摇唱机搬到系里来，边绘图边欣赏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和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臧筱珊”，多美好的名字啊！在没见到此人之前，男同学们都盼望着见到一个面目姣好、体态轻盈的苏州姑娘，但见到的却是一个瘦长高个的小伙子，不免觉得有点“名不副实”。但他在课间休息时，给大家演唱儿歌：“飞飞飞，飞到花园里”，生动活泼，表演特别到位，令人拍案叫绝。

同学们之间彼此都有一些绰号，但有一个是共同的，不论是男的女的，那就是“玄武”。玄武称谓的由来，是在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课中，讲到“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同学们感到特别新鲜有趣，彼此互叫，这个绰号就叫开了。有意思的是：梁先生也这样称呼我们。有一天，他走进了绘图室，看见室内只有张德沛和我两人，他就打趣地问：“怎么只有两只玄武在此？”

在梁先生家作客

1947年秋的一个下午，梁先生从美国回来后不久，为了更好地和我们认识，梁先生约我们到他家喝下午茶。大家来到了新林院8号，梁先生的客厅不大，但布

□ 我与清华

置得朴素、典雅。初次到老师家，我们都有些拘谨。不久，林徽因先生进来了，她神采奕奕地问：“老莫（指莫宗江先生）为什么还没来？”过了一回儿，莫先生匆匆忙忙地进来了，手中提着一包东西，说道：“地不平，我骑车差点摔跤。”林先生风趣地说：“你摔了倒不要紧，可不能把我的苹果 pie 摔坏。”大家都笑了。原来莫先生是去取林先生定做的苹果 pie，这时室内的气氛活跃起来，边吃茶，边聊天。梁先生和林先生从明式家具造型，谈到建筑等话题，深入浅出，十分精辟。梁先生指着柜上的一个“小猪”问大家：“你们欣赏这个‘小猪’吗？”同学们凝视着不知如何回答。从表面上看，这个“小猪”长十几厘米，是个陶器，趴在一个精致的小木基座上。梁先生说：“等你们会欣赏时就毕业了。”这“小猪”是一件北魏文物，线条简洁，造型特美，非常珍贵。后来“小陶猪”的故事在建筑系同学中传为佳话。

从那以后，我们 1946 级的同学不时到梁先生家做客，几乎每次林先生都出来和我们谈话。林先生的性格开朗、坦率、健谈，她和我们谈话的内容非常丰富，谈到建筑设计和舞台设计，谈到如何和梁先生一起调查中国古建筑，谈到兴奋处，甚至连梁先生和她谈恋爱的事也告诉我们。

创业维艰，建筑系的开创也离不开林徽因先生的指导。1947 年校庆，建筑系布置的学生作业展览，都是在林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她不顾自己病弱的身体，乘着黄包车夫老陶的车子，多次到水利馆进行现场指导，从展览的构思到具体内容的布置一一讲到，林先生为建筑系的成长真

是操碎了心！我们毕业的时候梁先生不在校，她特意到工字厅来，代表梁先生和大家相聚，照相话别。

迎接解放

1946 年至 1948 年间，内战正酣，社会动荡不安，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记得有一次，为了营救四名无辜被捕的师大学生，朱畅中先生还和我们一起在新华门前静坐到深夜。尤其是 1947 年的 5 月 20 日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张德沛还作为复员军人穿着美式服装举着大横幅，走在队伍的前列。

北平在 1949 年 1 月 31 日和平解放后，我们参加了一系列活动。最主要的是清华大学成立了“清华大学迎接解放行动委员会”，我们建筑系的同学大多数参加了其下属的“艺术工作队”，进城用绘画、舞蹈、戏剧和歌咏等不同形式宣传解放军和共产党的政策。2 月 1 日，解放军正式举行入城式，我们就站在前门大街的东侧列队欢迎。7 月 1 日，我们参加了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北平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庆祝大会”，我们坐在场地中间的土地上，首次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10 月 1 日，我们参加了开国大典，我们的队伍就站在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地方，亲耳听到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亲眼看见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升起，此时此刻，我们都感到无比的快乐与幸福。

奉献的一生

我们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度过了四个春秋，要过这四年的课程关确实不易。上半

天在听钱伟长或张维教授的“应用力学”或“材料力学”，这两门课每星期六一次小考，每月一次中考，期末大考，还要做不少习题；下半天就拿起画笔在名画家李宗津先生或李斛先生的指导下画素描，或者在高庄先生的指导下做雕塑。这两者似乎很难统一甚至对立，但作为一个建筑系的学生，我们只好克服困难熬过去。

解放前夕，有的同学休学或退学，从此没有了音信，如汪佩虎、刘仲良、黄振鹏等，但是，我们还是很怀念他们，希望有那么一天得到他们的消息。有的同学改名换姓，参加革命，如宋华沐改名钟涵，后来成为有名的油画家；有的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推迟了毕业的时间，以至在1950年的8月，如期完成四年学业的只有7人，也就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第一届

毕业生。他们是：杨秋华、朱自煊、张德沛、丁培良、黄畸民、虞锦文和钟炯垣。毕业后，杨秋华和丁培良被分配到俄文专修学校；张德沛和钟炯垣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朱自煊留校任教；虞锦文被分配到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黄畸民被分配到敌逆产清查管理局（北京市房管局的前身）。他们都勤勤恳恳地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干了一辈子。

我们有幸成为梁思成先生“手把手”教导出来的弟子，梁先生的思想、道德和品质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始终是以一个普遍劳动者的身份辛勤地工作着。如今吾侪老玄武们均已年愈古稀，回忆今生，我们无愧于心，我们是完全可以告慰于梁思成先生的。

怀念清华

○林水俊（1953 机械）

一转眼 60 年过去了。毕业离校时风华正茂，现在已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了。回想往事，我常常怀念在清华求学的三年，那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进入清华

我是 1950 年由印尼回国的。在国外生活了 20 余年，切身感受到由于中国积贫积弱，国际地位很低，中国人总被外国人看不起，受欺负。抗日战争时期，印尼的荷属殖民地政府不敢得罪日本人，却对中国人横加限制，动不动就驱逐出境。抗

战胜利后，外国势力仍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耀武扬威，我们爱国华侨青年深感不平和焦虑。1949 年得知解放军过长江时炮击了英国军舰而英国不敢报复的消息后，我们感到共产党行，中国有了希望。我就参加了回国同学会，决心回国学好本领，报效祖国。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又经历了 18 昼夜的海上颠簸，才到达天津。天津市长黄敬设宴欢迎，还告诉我们周总理曾特别关照过轮船公司，要严防国民党特务破坏，确保我们安全回国，这使我们备感祖国的温暖。我匆匆忙忙地到北京参加